

钱歌川



散文选集

荣获国家首届图书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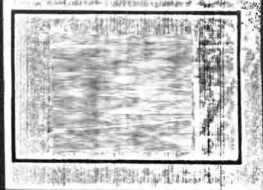
 百花散文书系·现代部分

主 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

百花散文书系·现代部分

主 编 林 呐 徐柏容 郑法清

钱歌川散文选集

杜学忠 武在平 编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钱歌川散文选集 / 钱歌川著; 杜学忠, 武在平编.
2 版. — 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4
(百花散文书系. 现代散文丛书)
ISBN 7-5306-0867-3

I. 钱… II. ①钱…②杜…③武… III. 散文—
作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066209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※

开本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1.75 插页 2 字数 165 千字

2004 年 8 月第 2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500 册

定价: 21.00 元

序 言

杜学忠

在翻译界和外语教师中，钱歌川的名字大概是人所共知了。他翻译过多种英、美、日本作家的小说，出版过近百种关于翻译和学习英文的书，特别是他的《翻译的技巧》从七十年代问世以后，一时洛阳纸贵，多年来在台湾省畅销不歇，在中国大陆也销行了五十多万部。一部学术著作在海峡两岸同时激起反响，恐怕并世无两。然而这一事业的成功并未给钱歌川带来多少欢乐，他说：“国内这一代的青年，把我看作一个专门贩卖洋货的人，使我很感到怅惘。他们心目中把我和英文等同起来，也是很不公平的。我一心只想恢复我固有的文人身份，多方努力只希望在国内能

再版一部文集。”(《苦瓜散人自传》)所幸的是，钱歌川的愿望实现了：自1983年以来，北京友谊出版公司和湖南人民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他的四本散文集，1988年2月，辽宁大学出版社将他的二十多部、三百万言汇成皇皇巨帙《钱歌川文集》四卷付梓，为这位散文宿将矗立了一座巍峨的丰碑。钱歌川，这位博古通今，学贯中西，有着扎实而绵长的创作生命力的文学前辈，带着他的累累硕果又回到读者中来了。



钱歌川，原名慕祖，自号苦瓜散人，又号次逊，笔名歌川，味橄，秦戈船。1903年生于湖南湘潭市郊的芷江，自幼喜欢诗文，深得塾师赞赏，又向塾师学习书法、治印，均有心得。1920年9月，负笈东游，先入日本东京东亚预备学校补习日文及其它学科，1922年2月考入东京高师英文科，课余兼学音乐。1927年出版了第一部译作《娱妻记》(英国哈代著，开明书店出版)。1930年，经夏丏尊、丰子恺介绍，进上海中华书局做编辑，后又与

周宪文、倪文宙合编《新中华》半月刊，从此活跃于文化界。1933年8月，与鲁迅、茅盾、田汉、邹韬奋等联名发表《中国著作家欢迎巴比塞代表团启事》。1935年6月，与叶圣陶、赵家璧等署名发表《我们对于文化运动的意见》；12月，与马良、蒋维乔、沈钧儒、钱基博等署名发表《上海文化界救国运动宣言》。钱歌川虽然早在1926年就在上海立达学园创办的刊物《一般》上发表过题为《誕生日》的短篇小说，但正式从事散文创作却是从三十年代开始的。1932年，钱歌川参加一个学术团体赴北平开会，得以畅游故都，返沪后即将北游时的所见所闻写成随笔小品在《新中华》杂志上发表，1934年结成《北平夜话》由中华书局出版。这是钱歌川以“味橄”的笔名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。从此一发而不可收，1935年出版了《詹詹集》，1936年出版了《流外集》，形成了钱歌川散文创作的第一个高潮。这两个集子的内容比《北平夜话》的视野更开阔、题材更广泛，开掘更深刻，在艺术上，也初步形成了他的散淡苦涩的风格。

1936年6月，钱歌川与叶圣陶、茅盾、夏丏

尊、郭沫若、郁达夫、郑振铎等联名发表了《中国文艺家协会宣言》，表明了他对时局和文艺运动的态度。8月，在中华书局的支持和蔡元培的帮助下，钱歌川怀着江海之志再度扬帆，前往英国伦敦大学进修英国文学，在船上结识了费孝通、徐诤、潘家洵等人。他远涉重洋、游观沿途及欧洲各国，将见闻所得写成一本记游文字，名曰《观海集》。他以渊博的学识，灵透的眼光慧解异域的历史和情趣，洞察其风俗文化，欣赏其山川风光，将埃及的骆驼、大漠、金字塔；威尼斯的游船画舫“弓它拉”；古城旁匹哀的春官秘戏、淫乐失度的遗迹；维苏威火山榴花似的血一般的滚滚岩浆；艺术之都罗马的教堂古墓，壁画雕像；但丁故乡翡冷翠的艺文人物；日内瓦碧冷冷的湖水，蒙勃朗、安纳西时时变幻、色彩纷呈的雪峰；欧洲海上花园葡萄牙的花坛喷泉、茂树繁枝；斗牛之国西班牙妇女盛装出游、招摇过市的奇观异俗，一一摄入自己的镜头。钱歌川的这些记游文字瑰奇壮丽，情文相生，熔知识性、趣味性、文学性于一炉，蔚成色彩斑斓的文章。

钱歌川赴欧不久，抗日战争即告爆发，全国上

下，同仇敌忾。钱歌川抗战不敢后人，毅然放弃海外悠闲的生活，闯关返回祖国。归途中在新加坡短期逗留，与郁树馄合编《南洋年鉴》，并参加华侨新闻工作。1939年8月，钱歌川前往四川乐山，任武汉大学外文系教授，重新走上告别十年之久的讲坛。1942年夏，经王云槐介绍，转至重庆英国新闻处主编中文刊物《世说》周刊，从事抗日宣传，同时兼任东吴、沪江、之江联合大学教席。其间除了教书，译书，编辑刊物，钱歌川依然坚持为《新中华》和刘英士主编的《星期评论》以及其他刊物撰写随笔小品。他这一时期的作品，大都编入重庆中华书局出版的《偷闲絮语》和《巴山随笔》；少数文章收入1948年在上海中华书局出版的《游丝集》。抗战期间，巴蜀米珠薪桂，物价暴涨，钱歌川入不敷出，常靠借债度日，但他始终以积极乐观的态度与国人共渡时艰。在文学主张上，则提倡为抗战服务，认为“可以写日本兵的残暴行为，又可以写后方人士的抗战意识，以及许多与抗战有关的小事”，但反对空喊口号，主张以“事实去做题材”，“寓宣传于文学作品”，以期“收宣传之效于无形，使读者于不知不觉中受着

我们的影响。”(《偷闲絮语·抗战宣传与文学》)钱歌川忠实地躬行这一主张,在他这一时期的散文随笔中,大都是通过对具体生活事件的叙写,反映抗战时期大后方人民所渡过的艰苦岁月,控诉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。《偷青节》,便是一篇这样的文章。钱歌川这一时期的散文虽然多写苦难,但是字里行间跃动着昂扬的战斗情绪和深挚的爱国热情,并且将生动的叙述、剴切的议论、郁烈的抒情融为一体,淋漓尽致地发挥了散文艺术的社会功能和审美作用,这是他散文创作的第二个高潮。

1945年初,钱歌川参加了“友联社”,社员有朱世明等人。2月,与郭沫若、茅盾、巴金、老舍、冰心等在重庆《新华日报》署名发表《文化界对时局进言》,敦促政府“及早实现民主”,“组织一战时全国一致政府”。(该文由郭沫若执笔,后经修改编入《沸羹集》)8月,钱歌川和全国人民一道迎来了抗战胜利。1946年3月,朱世明担任了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团团长,以钱歌川谙熟英、日文,便请他做秘书主任,随团出川飞赴日本东京,参与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的工作。但因不耐案牍之

苦，一俟创办任务完成后，便辞职回国，到南京教育部任学术审议委员会专门委员，主管全国英语教学工作。1947年春，应台湾大学校长陆志鸿之聘，前往台北创建文学院并任院长。钱歌川从1947年入台，到1964年离台，在台湾整整生活了十七年。在繁重的行政工作和教务之余，仍坚持笔耕，先后出版了《淡烟疏雨集》、《三台游赏录》、《虫灯缠梦录》、《竹头木屑集》、《狂瞽集》、《搔痒的乐趣》、《罕可集》等七八个集子，形成了他散文创作的第三个高潮。钱歌川这一时期的作品，主要记述台湾的风俗文化，山川景物；作者个人的生活经历，思想变迁；还写了许多知识小品、文艺散论和针砭时弊的杂文。

1964年6月24日，钱歌川怀着“何期垂老复投荒”，“秋风吹梦到南洋”的无限感伤和庆幸自己逃脱藩篱而又恋念家国的复杂心情，从台北松山机场起飞前往新加坡应聘。先后到义安学院、新加坡大学、南洋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和翻译课。其间所写的一些游记、小品和文艺散论大都收在《秋风吹梦录》一书中。1972年底，钱歌川以七十高龄退出讲坛，移居美国纽约。钱歌川一生奉行三书主义：“教书、读书和著书”（《三书主义》）。

退休后，不甘闲居，便以写作为正职，阅读为副业。十数年间，除有关英美语文及论翻译的著作外，小品随笔竟有《客边琐话》、《篱下笔谈》、《瀛溪消闲录》、《浪迹烟波录》、《楚云沧海集》、《云容水态集》、《苦瓜散人自传》、《浮光掠影集》等八部文集付梓，形成了他散文创作的第四个高潮。钱歌川这一时期的作品，题材极广，数量极多，文字则任意走笔，无所顾忌。总要“写到畅所欲言，兴尽为止”（《楚云沧海集·行年八十》）。他侨居纽约十八年，却一直不肯在美国落籍，至死都是一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。1974年和1978年，他两次偕夫人回祖国大陆探亲观光，第二次来时还应邀出席了国务院举行的国庆宴会，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和美和温馨。1986年，钱歌川将自己辛劳一生的部分积蓄八千美元捐赠湖南大学作奖学金，支援祖国教育事业。1990年10月13日，钱歌川走完了他八十八年的人生历程，在纽约病逝。

二

我们要想比较准确地从总体上把握一个作家

的主要倾向，必须把他放到一定的时代背景和创作环境中去考察。钱歌川在三十年代开笔写散文小品的时候，正是国民党反动派法西斯统治和文化“围剿”最为紧烈的时刻，特别是在当时政治文化中心的上海，更是犬多网密、文禁如毛。在白色恐怖和政治压力下，小品文领域里的分野和斗争也趋于明朗化。林语堂陆续创办了《论语》半月刊（1932）、《人间世》半月刊（1934）、《宇宙风》半月刊（1935），提倡“幽默”和“灵性”，主张小品文“以自我为中心，以闲适为格调”，“宇宙之大，苍蝇之微，皆可取材”（《人间世·发刊词》）。并且认为小品文的写作“无关社会学意识形态鸟事，亦不关兴国亡国鸟事。”（《小品文遗绪》）。在他创办的刊物上发表了大量充满闲情逸致，或谈论琐碎掌故的小品随笔，掀起了一股小品文创作的热潮。但是以鲁迅为代表的左翼作家反对林语堂等人的错误倾向，认为“《人间世》之类，则本是麻醉品”（1935年2月14日致吴渤信）；“专读《人间世》或《论语》一两年，而欲不变为废料，亦殊不可得”（1935年1月8日致郑振铎信）。鲁迅提倡战斗的小品文，说它“是匕首，是投枪，能和读者杀出一条

生存的血路的东西”(《小品文的危机》)。钱歌川正是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下;正是在“形形色色,新的旧的,右的左的,中的西的,都在各显神通”(钱歌川:《苦瓜散人自传》)的文化气氛中步入文坛的。既不属左翼,也不属右翼,既与林语堂保持友谊,认为林语堂给小品文注入了“一种新的生命”,“助长了小品文的成就”(《谈小品文》);又与穆木天、冯乃超等左翼作家过从甚密,赞赏他们的普罗文章。钱歌川的这种立场和态度,必然要在他的创作题材和创作风格上或隐或显地反映出来。从他三十年代出版的《北平夜话》、《詹詹集》、《流外集》等书里的绝大部分篇章来看,他并不像林语堂、周作人等人这一时期所写的文章那样鼓吹闲情逸致,也并非不食人间烟火,他没有写使人玩物丧志的东西,作品也不是“麻醉剂”和“小摆设”。从题材内容看,他的大部分散文反映现实、贴近生活,对于改善人间的弱点,矫正社会的陋习,补救世道人心,都能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。从文风上看,由于他有深厚的民族文化根底,又精通两门外语,深受西洋文化浸染,所以他的文字从容博雅,视野开阔,有学者气度,却又并不一

味追求闲适、古趣或掉书袋。但是，从另一面讲，他对政治少有兴趣，也没能反映出尖锐的政治斗争、阶级矛盾，或时代的风云变幻。从他的作品里很难找到深入斗争漩涡或走进生活激流的题材内容。王礼锡希望他“成为一个中国的辛克莱”，但他“不是辛克莱的信徒”，未成为文字宣传的斗士（《纪念王礼锡》）。在文风上，也不像鲁迅那样老吏断狱般的深刻犀利，泼辣沉重，更缺少鲁迅那种指手斥敌的战斗风采和英姿。他把自己的作品称作“夜话”，说自己的书里，“满纸都是些詹詹小言，真不足以当大雅一粲”（《詹詹集·序》）；说自己是“以闲人作闲话”，“人所不屑道者，我乐道之”，所以作品“既不入流，又不成品”，都是些“流外之作”（《流外集·小引》）。后来又说自己的短文“不三不四”，无非是一些“竹头木屑”（《竹头木屑集·后记》），“狂言瞽说”（《狂瞽集·自序》），“鸡头鱼刺”（《罕可集·自序》）。他还说自己写了几十年，没有写成一篇像样的“大作”，别人读了都好比“麻姑搔痒”，并希望读者“去从他这些废物中，找出它的用途来”，以备“尺寸之用”。就其散文创作的总体倾向而言，钱歌川的这些话，一半是自谦，一

半是实情，也可以说是“如鱼在水，冷暖自知”的较为恳切的自评。钱歌川没有躲进象牙之塔，创作没有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，没有忘怀现实，没有漠视人生，但是他也未能走向十字街头，深入劳苦大众，未能亲临荒波大海，去冒暴雨狂风，他是坐在避风港里听涛声拍岸，看海燕惊飞，在楼头窗口，看外面的世界，听窗下的市声，因而我们很难从他的作品里感受到惊心动魄的雄伟力量，很难看到杀伐搏击的刀光剑影。

在钱歌川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，写了七八百篇散文作品，要说篇篇精彩，那自然是离实际过远，但施蛰存说他的文章“太杂，似乎离纯文学远了一些”（转见钱歌川：《故园东望路漫漫》），也未免冤枉了钱歌川。这个批评，用于他的部分作品是合适的，加之全体，则有失公平。钱歌川的不少散文随笔，不仅有较高的文学性，而且在艺术上也有独到之处：

第一，在他的散文里，洋溢着一种苦涩幽默的风韵。钱歌川喜欢幽默，而不赞成直接的嘲讽，认为“冷嘲热骂的文章，使人一读即知为冷嘲热骂，所以不免浅薄庸俗。唯有在字面上毫无嘲骂

的痕迹，而骨子里实在是嘲骂，这才是最高明的写法。”（《秋风吹梦录·小品文写作技巧》）所以他主张“把悲剧去喜剧化”，去“苦中寻乐”（《悼学仪》）。这是他的美学追求，也和时代环境，本人性格，以及他的处世态度相关联。钱歌川是一个性格内向而又不乏幽默感的人，内心世界极为丰富，感觉非常灵敏，看得透一切世相，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，鄙薄庸俗的不合理的社会现象，但他又不愿直面挑战，不愿冷嘲热讽，更不想做文字狱的主角，所以便住往用笑来面对人生，用笑来映照社会的苦痛。不过他的笑，有时是苦笑，有时是强笑，却很少大笑和狂笑。有人评论说，钱歌川的文章，“内容博雅，文笔清畅，谈事无嬉笑怒骂，一览无余的犷态，恰如其笔名含义，如嚼橄榄，深有余味。”（转见《钱歌川文集·引言》）我们读他的散文，特别是三十年代的散文，确实也有同感。他的文字没有一泻千里的涛涛气势，没有汹涌澎湃的湍湍急流，不是铜钟大吕，少作大气宏声，一文过目，也许并不觉得怎样精彩或感动，但静下心来，细细咀嚼，却能从中品出一股青果般的苦涩和清香。里面也有幽默，但不会使你捧腹，而只是令

你会心的摇头苦笑。如《飞霞妆》，是写故都北平的风貌。文中说这里的风沙构成了这个故都的要素，北平若没有了风沙，正同日本人久不感到地震一样，人们就要觉得寂寞，觉得有些不够味儿：“每当风沙起时，北平人就发生一种亲密之感，洋车夫和苦力拿它当爽汗的扑粉，安步当车的穷教授嗅到表现艺术的土香。”作者说：“一个代表的中国人，一定能赏鉴北平的古香古色，一定能在灰尘中喝‘醉梅汤，在大街口嚼‘硬面饽饽’，赞美‘当炉女’，反对‘女招待’，说到古物的保存，尤其要拥护古代传下来的风沙。”在这里，作者娓娓而谈，不动声色，只是叙述而不加评论，感情色彩也几乎淡到难以察觉。粗心的读者，还可能误以为作者是在赞美北平的风沙，其实，这是明褒暗贬，以恭维代责骂，细心的读者，会隐隐悟出这是嘲讽统治当局不修市政，收捐敛钱，却从不把钱用来改造自然环境，致使“古代传下来的风沙”绵延不绝，肆意为虐，给市民带来不尽的苦难，而久居故都的百姓也已经习以为常，安之若素。全文荡漾着一种疏淡的情，苦涩的味，酸楚的笑，文思曲折而巧妙，确实有着别具一格的风韵。